

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之研究 (1955-1996)

黃 煜、祝建華 *

《摘要》

本研究對中國大陸省際新聞相互間的流通進行了長時段的定量研究，它在幾個方面呈現出一定的創新努力。第一，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初步的省際／區域新聞傳播流量分析的整體框架，首次將國際傳播中跨國新聞流通的研究框架拓闊為對中國國內省際間的研究，並用以檢驗這一方法對某些大國內（例如：俄羅斯、中國大陸、印度等）區域之間的資訊流通研究有效性。我們希望借助必要的調整和補充，拓闊相關的研究領域，以增強該理論框架的解說能力。第二，運用長時段系統的資料搜集和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索中國大陸新聞媒介省際新聞資源縱向分布，並初步描述其新聞流通之狀況和時空變化之連續性。第三，就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出現的區域化、地方化互動趨勢及橫向網路的情況從新聞傳播的角度提供第一手資料，從而逐步嘗試構畫出一幅當代中國的地理政治資訊地圖，它可以為諸如政治科學、公共管理，以及社會與經濟領域的其他研究工作提供基礎資料。

關鍵詞：新聞資訊流通、中國省際新聞媒介、省際新聞流通、長時段分析

* 本文作者黃煜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s03033@hkbu.edu.hk；祝建華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副教授，E-mail: enjhzhu@cityu.edu.hk。

壹、導言

國際傳播研究文獻中，國際新聞流通一般指一個特定國家的新聞傳媒對外國的報導，它反映並加強了國家間強勢地位及其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論點已一再被七十年代以來傳播學者大量的研究所證實。但是，先前的研究主要聚焦於跨國界的新聞流通和國際間的資訊或文化產品的傳播，鮮有將研究的觸角涉及到媒介產品和新聞資訊在一國之內跨區域的流通傳播。然而，國境之內跨地區的新聞流通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對於疆土遼闊、民族多元、人口眾多的大國更是如此。就此而言，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澳門、台灣）是一個很適合進行研究的個案。誠如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D. Goodman所言，「中國應被視為一個大陸體系，而不僅是單一的國家（來進行研究）」（Goodman, 1997: 44）。事實上，作為一個擁有逾三十個省份（包括省級自治區、直轄市），總人口超過十三億的大國，其區域間（在此，也可視作省與省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涉及國家統治與發展的重大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涉及國家之整合的中心議題。

一般認為，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發生了兩個重要的共時變革現象：垂直互動關係（中央與地方）的削弱與水平互動關係（區域之間）的加強。考慮到後毛澤東時代改革運動（1978--）所形成的中央權力下放（主要體現在行政管理和財政分配方面）與社會多元化的趨勢，以上變化更具有重要意義。顯而易見，在實行列寧共產模式的中國大陸，傳播流通及資訊控制在此過程中舉足輕重。因此，中央與地方、省與省之間的資訊流通的質量和數量，是考察中央整合力及各地水平相互依賴關係的重要參數。更具體而言，在當下中國政治傳播的譜系中，新聞與新聞媒介依然是關鍵的資訊及渠道來源，省際間新聞流通總量及分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了解水平互動關係和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指標。雖然中國問題的學者們都承認研究中國大陸地區變化及區域互動關係的重要性，但是，至今無人能系統從事此項工作並以豐富的實證事例去推動這個課題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中央與地方關係和數個省個案或比較研究方面（有關文獻回顧，可參考Wu & Zheng, 1994; Jae Ho Chung, 1998: 419-456）。其原因可能在於省際資料收集的難度和設計，也可能由於缺乏可行的省際／區域研究的整體理論框架。有鑒於此，我們在上述的兩方面進行了嘗試，以期順此脈絡，漸進梳理，彌補現存文獻之不足。

本研究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創新努力。第一，它提供了一個初步的省際／區域新聞傳播研究的整體框架。通過對新聞流量之間關係的分析，我們首次將國際傳播中跨國

新聞流通的研究框架拓闊為對中國國內省際間的研究。並用以檢驗這一方法對某些大國內（例如：俄羅斯、中國大陸、印度等）區域之間的資訊流通研究有效性。我們希望借助必要的調整和補充，拓闊相關的研究領域，以增強該理論框架的解說能力。第二，運用長時段系統的資料搜集和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索中國大陸新聞媒介省際新聞資源縱向分布，並初步描述其新聞流通之狀況和時空變化之連續性。第三，就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出現的區域化、地方化互動趨勢及橫向網路的情況從新聞傳播的角度提供第一手資料，從而逐步嘗試構畫出一幅當代中國的地理政治資訊地圖，它可以為諸如政治科學、公共管理，以及社會與經濟領域的其他研究工作提供基礎資料。

貳、國際間新聞資訊流通研究框架

「外部世界及其在我們腦海中的圖像」，這是Lippmann（1922）《輿論學》第一章的標題，也是Lippmann提出的經典命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部重要著作中就已論證並指出，世界已經變得如此複雜，以致普通市民再不可能依賴直接經歷去認識它，必須依靠大眾媒介來吸收外部世界的資訊。由於傳播過程的把關人和眾多其他的因素，在外部真實世界與人們腦海中的圖像之間，總是存在著種種差距。許多學者進一步認為（例如，Ball-Rokeach & DeFleur, 1997），隨著世界日益「傳媒化」，人們對其它地方、其他國家及國際間的政治、經濟和他重要問題的認識，正愈來愈被新聞傳播和其他傳媒機構所操控。在當今所謂的全球化浪潮中，這種過程被社會學家Giddens（1990: 64）定義為一種新的全球社會關係強化的努力。在這類建構活動中，一個地區的人和事會較易受到相距甚遠的另一地區發生的事件或人的影響，反之亦然。這種互動影響構成了不同地區間的聯繫和日益密切的交往，而國際間的新聞資訊交互流通就是其中的一項中心環節，因而備受傳播研究的重視。

1953年，國際新聞研究所（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發布了一份重要報告，指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新聞交換流通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從那以後，國家間新聞和資訊流通的結構性問題和失衡現象已成為國際傳播學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早期，這個問題更演化成政經學術混為一體的「建立國際資訊傳播新秩序」（NWICO）大辯論（有關早期研究，可參閱Galtung & Ruge, 1965; Hester, 1971; Schramm & Erwin, 1981; Stevenson & Shaw, 1984; UNESCO, 1984。有關「新秩序」辯論背景資料可參閱Hamelink, 1983; Stevenson, 1988）。

1990年代以來，世界進入後冷戰時期，儘管地緣政治發生重大變化，世界正趨向「全球化」的整合過程。但是，其依據的遊戲規則和典範規章未變，既存的市場資本

主義的國際體系之基本結構依然未變 (Wallerstein, 1993, 1999)。因而，就國際間新聞資訊流通而言，結構性的單向和失衡現象，美國獨霸宰制以及發達國與不發達國不平等交換等問題不僅未能緩解，反而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 (有關新近研究可參見 Herman & McChesney, 1997; Golding & Harris, 1997; Sreberny-Mohannadi, et al., 1997)。

概括言之，在國際傳播研究文獻中，通過對不同國家之媒介對外國的報導所作的分析，學者們已經在宏觀上總結了數種帶有普遍性的模式。其要點可歸納點如下：首先，一些國家被報導的範圍、次數、頻率及強度遠勝於另一些國家，這主要取決於該國的政經實力強勢，而與人口疆土等因素關聯不大。第二，國與國之間的相互報導常常是不均等的，資訊貧乏國對資訊富裕國的報導遠多於後者對它的報導。第三，相對於資訊富裕國而言，資訊貧乏國之間的新聞流通顯得很少，甚至幾乎沒有。第四，這種持續的不平等的國際新聞流通，已間接導致了一系列後果，包括不平等的貿易伙伴關係，以及發展中國家人才流失到發達國等等。(有關上述詳情，可參看Tsang, et al., 1988; Wu, 1998；有關研究，可參看Hester, 1971; Kariel & Rosenvall, 1984)。大量的文獻更顯示，這些現象主要可以歸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1. 政治意識形態因素 (參閱Gerbner, 1964; Shurnik, 1981; Herman and Chomsky, 1998; Graber, 1989)。
2. 國家利益 (參閱Ostgaard, 1965; Mowlana, 1984; Herman, 1986; Chomsky, 1987)。
3. 文化及地理上的相關性 (參閱Maclean and Pinna, 1985; Galtung & Ruge, 1965; Lent, 1976; Kariel & Rosenvall, 1983)。

以上扼要回顧表明，數十年的文獻累積已經為國際新聞資訊流通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典範和分析框架。因此，國際傳播學者Hamelink在此基點上，曾頗有見地提出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國際間的新聞資訊流通失衡現象也可能發生在一國之內的區域中 (Hamelink, 1995: 306)。順著這條思路，我們有理由認為，類似的結構性模式與類似的失衡結果可能存在於同一國家地區之間的新聞資訊流通中，尤其是那些擁有眾多人口、廣闊疆土的國家。我們相信，經過必要的修正和相關性因素補充之後，這套成熟的分析方法可以借鑒並作為一國內新聞資訊流通研究的基礎框架。

參、中國大陸「省」的研究三種取向

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一般認為，自1949年以來，「省」一級（包括中央直轄市和自治區）已經成為中國大陸最重要及獨立的次於中央政府的管治單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歷史中，1950年代曾短時期設置高於省的「行政大區」，但很快就取消了。另一方面，目前尚難將「省」以下的「地區」及「縣」視作實質與關鍵的行政單位，雖然他們各自發揮了重要的地方功能。就此而言，「省是通往地方各級的樞紐」（Lieberthal & Oksenberg, 1988: 344）。因此，本研究選擇以「省」作為基礎對象是合適的。

大陸自19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運動，極大地改變了毛時代的省際關係結構。省不僅成了中央和地方關係的交匯平台，同時也為各省際間橫向互動互利創造了新的契機和有利條件。正如Peter Cheung所說，經濟改革已經顯著地改變了中國政治形態中省級關係的性質、互動進程及其理性化的調整，也因此，各省之間的聯繫變得更為活躍密切（Cheung, 1998: 36）。與此相關，學術界近年明顯增多了對中國大陸「省」的研究，有關文獻數量隨之迅速增長（有關綜述可參看Chung, 1995; 1998）。透過對相關文獻查閱和梳理，我們認為目前學界對中國大陸「省」的研究，主要有三個取向：

第一種是「中央——地方」的研究取向。這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傳統思路，主要著眼點為中央和省（地方）之間的關係。它使用不同的政治經濟理論、模式及分析方法，探討中央與省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問題上的互動內容及形式。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央與省的關係在權力架構、利益維護、政策制定，以及資源分配方面已經逐漸演變重組。所以，這一研究取向的重心一方面著眼於權力轉換與政治經濟交往的意義，另一方面著眼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制度化進程的影響。數十年來，已有大量論述及豐富的文本可供參考，其中較有影響或較為系統可枚舉：Teiwes, 1971; Goodman, 1986; Liebertha & Oksenberg, 1988; Wu & Zheng, 1994; Shirk, 1993; Jin & Lin, 1994; Breslin, 1996; Li 1998。

第二種取向是「區域比較」。這種方法近年日漸受到青睞，凸顯重要。它主要關注區域發展中的不同社會及經濟問題。另一個研究重點集中在區域間的不平衡現象和發展模式的分析。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Chan, Hsueh and Luk, 1996; Zhao 1996; Wang & Hu, 1999等。

第三是「省的個案研究」取向。這方面的研究近年開始受到一些學者重視。此類

個案研究通常選取一個省份，或者集合數個省份為對象，就領導層權力來源、政策制定、發展戰略、經貿投資以及資源分配進行研究，以期發現其中的變化及模式（具體成果可參看Forster, 1990; Yeung & Chu, 1994; Goodman, 1997; Cheung, et al., 1998）。

顯然，以上三種研究取向都為了實現各自的研究目的而設計，方法上無所謂優劣高下，但分析闡釋上則各有利弊。「中央——地方」取向研究主要關注「省」與中央（北京）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但是，如果不考慮省際間的互動，又怎能深入理解上述關係在日益活躍的橫向交往中的意義？排除了省與省之間的交往互動，很難深刻理解中央與「省」之間的關係變化。「區域比較」方法將諸多省份劃為大塊地區（例如：沿海地區、中部地區、內陸地區），而不是針對個別省際關係及它們的互動情況探討其間性質，這樣一來，它在解釋區域發展和問題的同時，忽視了省際互動和差異這一重要因素。此外，這種研究方法較多關注經濟發展領域而較少涉及其它方面。「個案研究」取向雖然提供詳細的某省份的資料，但是這種帶有個案研究傾向的方法本身不能提供全貌性質的說明和理解，但它可以為進一步的省際研究奠定基礎。

透過以上簡要的文獻回顧和分析，可以看到有關「省」的研究幾乎都未能涉及系統的省際互動領域。因此，作為以上三種取向的補充，我們在此提出第四種研究取向，即：進行全國範圍內的省際關係和互動之研究。我們認為，只要目前大陸市場經濟及區域開放的進程持續下去，各省將在某種程度上弱化與中央的關係，同時加強它們本身之間的互利交往。因此，省際關係將必然更形重要。當然，本文研究的對象是新聞資訊，通過對所有省際新聞報導定量去分析、探索省際資訊流通關係，它祇是省際互動關係的一個方面，但是，其重要的潛在價值則不容忽視，正如地緣政治學家Richard Muir所指出那樣（Muir, 1981: 113）：「各地域之間資訊流通的水平及其變化，反映了它們之間聯繫的力度，以及趨向分離或整合的走勢」。

肆、地方媒介與省的政經互動

在實行列寧式的共產主義模式社會中，新聞媒介在國家運作和社會控制中扮演關鍵角色。研究中國傳媒學者A. Liu曾精闢地指出，這類國家之傳媒本質包含了幾個重要特徵，即意識形態主導、教化啓蒙、激勵鼓舞與黨性原則。意識形態主導：傳播內容明確地由官方教義組成；教化功能：為黨的各項政策進行說教；激勵功能：不惜犧牲事實真相去取得理想的宣導效果；黨性原則：現領導層有極大權力控制傳播內容與發放渠道，為統治層的需要演繹官方意識形態（Liu, 1988: 265）。雖然過往二十多年

的改革開放，傳媒業在許多方面，尤其是管理運作層面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是傳媒的黨性本質依然故我。不少研究已經指出，共產主義政權對傳媒的控制與制度改革的問題，是關乎黨國政治體制生死存亡的大事（可參閱Lee, 1994; 2000; Polumbaum, 1997）。因此，爭取傳媒自由自主的過程必然伴隨著長期的、充滿困擾與挫折的反覆激烈鬥爭。

至於省級傳媒，除了參與推動地方變革之外，還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中扮演了關鍵的中介角色。就此而言，作為省的喉舌，它主要是具備三種功能：1. 國家意識形態與政策法令的傳送者；2. 成為省當局意旨的權威聲音；3. 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相互較量的中介代表，並在漸變中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中，為本省謀利製造輿論。在整個後毛澤東時代，省的利益在政策制定及實際操作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省的領導層已經有相當大的空間藉自己掌控的傳媒實踐其自身的政經議題，演繹中央政策使其對本地有利，並尋求主動，製造有利本地的輿論向中央間接施壓，這已不乏先例。例如廣東省，省領導在後毛澤東時代用中央開放政策自行制定發展計劃而不是緊跟北京的路線，根據自身需要再演繹中央有關政策，並時常頂著保守派斥其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批評爭取主動權或大打「外國牌」，從而創造了「廣東現象」。顯然，在以上進程中，省的新聞傳媒為「廣東改革經驗」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Vogel, 1989; Li, 1996）。

在大陸目前的傳媒結構中，儘管電視近年大為流行，報紙在政治傳播中仍執牛耳地位。在目前全國逾一千五百份地方報紙中，有三十家法定的省級官方喉舌，又稱「省委機關報」（註：1998年起又增添了重慶為省級單位）。這三十份省委機關報完全反映領導層的政策指示與偏好，它們處在省委的直接領導下。因此，某種程度上，它們對其它省份的報導不僅僅是單純的編輯決定，也同省的領導層對其它省的利益考量有關。換言之，省級媒介占據著戰略性的地位，通過某些機制對其他省份的資訊進行篩選，決定是否讓其流入本地區。這種傳遞既涉及政治因素，也涉及編輯程序。這個情況說明，中國地方傳媒的運作是一塊有待深入探索的領域。

雖然近年湧現相當數量有關中國大陸傳媒的研究文獻，但關注的問題主要是全局的結構、功能及內容的變化或個案的調查分析（如Chu, 1994; Zhao, 1998; He & Chen, 1998; Lee, 1994; 2000）。然而對地方傳媒的研究，尤其是省際新聞傳播領域就顯得極為不足。針對這一現象，傳播學者A. Liu曾提出：「從現在開始，我們不能將中國大陸傳媒研究侷限於宏觀總體範圍，而應該從國家的、地區的、省級的、公共的、局部等各層面上，去探索中國大陸的傳播變革及其發展」（Liu, 1993: 121）。

但是，根據我們的文獻梳理，近年僅有一篇研究報告考察了大陸五個省份的機關報對國際新聞的報導（參見Chang, Chen & Zhang, 1993）。此文對局部地方傳媒的運作和編輯細節提供了極為有用的第一手資料，但是它的選擇性質（從30個省份選出5個）及祇對「國際新聞」單一品種的分析，決定該研究無法對中國省級傳媒狀況和新聞流通提供相對全面的瞭解，其侷限性是明顯的。因此，就省級新聞流通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系統考察不僅必要，而且將拓展對大陸傳媒研究的範圍。

伍、研究問題與方法

在本文中，我們有以下幾個研究問題和關注點：

- (1)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的總模式與變化形態；
- (2) 「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6）、「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後毛澤東時代（1977至今）三個階段的比較；
- (3) 各地社會經濟變革在省際新聞流通變化中的側面反映，通過考查各省的區域互動，進而為下一步探索它與五十年來社會變革的關係打下基礎。

我們將這項研究定位於基礎性的探索，試圖用系統的內容分析方法首先對所有省分相互間的新聞報導進行完整勾畫，因此，我們選擇以縱向設計的手段收集資料。具體操作上，分別選定了三個年段，在每個相距二十年的時段中，又分別選取兩個連續年份點。為了減低特定年份中特殊事件的影響，每個時段都分別包括這兩個年份。最近的時段為1995-1996年，接下去為倒溯二十年的1975-1976年（「文化大革命」末期），最後為再倒溯二十年的1955-195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社會主義改造」早期）。這三個年段分別足以代表各自的十年時段（下文或簡稱為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總而言之，這樣的選擇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反映過往四十多年間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歷史軌跡，也在我們研究可以駕馭的範圍內。

正如先前提到的，在大陸目前的傳媒體制下，某一級黨的機關報是相應一級的中共宣傳喉舌，因此，省委機關報也就是某省領導層的輿論工具。這種性質使得其它新聞傳媒不可能就「正統」地位和角色與之競爭。例如，各省的晚報，雖然其讀者數量，內容編採遠優於黨報，但在官方資訊的傳遞，政令輿情的闡釋上，黨報的權威地位無可替代。此外，省委與省機關報之間的聯繫遠較其他傳媒來得密切與直接。據此，本文順理成章選擇了每個省的省機關報作為代表媒體，並以省機關報對外省的新聞報導作為研究的對象。除此之外，選擇省機關報還有實際操作上的考量，即中共主政後，各省的機關報就已經創辦發行，而晚報與地方電視台等媒介興起與流行則是到

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後才出現的狀況。

關於操作與抽樣過程的幾項說明：

(1)1955-56年間的三份省報不適用於全部三個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76年間依然闕如：《西藏日報》1956年後期才創刊；《寧夏日報》1959年創刊；《海南日報》八十年代晚期才出現。因此，在三個年段中的省報樣本數字不一樣；1955-1956年間二十七份，1975-1976年間二十九份，1995-1996年間三十份。爲了保持連貫性，我們只使用二十七份省報樣本在三個年段內進行比較，二十九份樣本就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進行比較，九十年代的對比則使用三十個樣本。

(2)在所選擇的六個年份中，我們就每一年的四個星期二十八天內的省報進行全體抽樣調查，或者說，在我們的樣本中，包括了四千八百一十六期的報紙。⁽¹⁾因爲樣本的規模必須大到一定程度才能進行內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選取一或兩星期），而我們的初步檢測發現大部份省報很少報導省際間的新聞。

(3)由於本研究只關注省際間的新聞報導，其他表述意見的文章（例如，社評、評述、讀者來信等）、副刊、廣告、天氣預報等非新聞的東西均被排除。然而，最大的問題在於，如何界定「省際」新聞報導：它是否一定要涉及他省人事？事件是否一定要發生於他省？或者，它是否一定是外省人士在外省發生的事？爲此，我們參照有關國際傳播研究傳統界定的「國際新聞」定義闡釋來制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際新聞報導之定義。

在學界，傳播研究者將「國際新聞」以消息主角人士與地點排列出四種形式：(1)本國人士在本國；(2)本國人士在外國；(3)外國人士在本國；(4)外國人士在外國。形式1與4性質分明，前者是國內新聞，後者毫無疑問是國際新聞。形式2與3較爲複雜。一般研究的慣例是以事發地點而不是事件主角爲劃分標準。據此，本國的領導人到外國訪問（形式2）是國際新聞，而一位外國領導人的來到（形式3）屬國內新聞。

我們依照以上慣例，以事件是否在外省發生對新聞報導進行分類，而不理會是否有本省人士牽涉在內。「本省」指的是研究中的報紙出版所在地，「外省」是指「本省」以外的所有省份。⁽²⁾假如一則報導涉及的外省超過一個，我們會使用多個省的條目。⁽³⁾

三位來自一家中國一流大學新聞圖書館的資深人員承擔了資料收集任務。他們首先運用前述標準對選自三十份省報的新聞報導進行分類，然後根據下述條件逐項進行編碼：(1)事發地點（即外省名稱）；(2)它們的數目；(3)是否涉及本省人士；(4)報導的類型（普通新聞、簡明新聞、新聞圖片）；(5)刊登位置（頭版或內頁）。由於編碼指

引清晰，編碼人員素質較高，並經過反覆訓練，最後相互間的編碼一致度達到了完全滿意的標準。

陸、研究發現與分析

表一：省際新聞流通量統計表

	1955~56	1975~76	1995~96
兩年內消息總數	2907	1509	7269
每天平均數	51.9	26.9	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數	2.0	1.0	5.0
單省消息比例%	87.2	84.9	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	66.3	82.7	62.5
簡訊%	7.3	2	25.8
相片%	26.5	15.3	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	2.2	2.4	2.4
頭版消息%	49.8	40.5	4.8
新聞主題：			
政治軍事%	14.1	36.5	10.6
經濟發展%	63.8	35.8	35.7
科學技術%	8.3	10.1	16.4
文化娛樂%	7.5	4.5	15.2
罪案%	1.9	0.7	9.4
天災人禍%	1.4	8.4	4.2
趣味%	2.9	3	6.3
其他%	0.2	1	2.1

註：以二十七省為準，不包括《西藏日報》、《寧夏日報》、《海南日報》；1955~56年首個數字包括二十七份省報，第二個數字加上《西藏日報》、《寧夏日報》；第三個數字包括了《海南日報》在內的三十份省報。

一、總體情況描述

表一為三個年代所選樣本的總數據，共有11,685條省際消息，其中7,269條（62%）為1995～1996年間的；2,907條（25%）為1955～1956年間的；1,509條（13%）為1975～1976年間的。即使我們將1995～1996年間的數字打半折——因為這些報紙至九十年代中期後每天出8版，之前只有4版——九十年代比起以前的年份，仍然有更多的省際間的新聞報導。分別為3,653比之五十年代的2,907、比之七十年代的1,509條。

如果將數字除以56（每兩年樣本中的天數），我們得出1955～1956年間，中國大陸所有省報的省際消息每天只有52條，1975～1976年間只有27條。目前，每天大約有130條省際消息在全國各省流通。如果我們再將數字除以26（被某一特定省份報導過的省數目），⁽⁴⁾可以看到一幅更清晰的圖像：1955～1956年間，平均每份省報每天只有兩條外省消息，1975～1976年間的每天只有一條，目前則為五條。

上面的計算多少低估了省際新聞消息的刊登量，正如早前提到的，部份消息中包括了不止一個省份。如表一所示，有一小部分屬多重報導，但數量極有限。例如，1955～1956年間，每條消息所涉省數1.25省，1975～1976年間為1.34省，1995～1996年間為1.09省。⁽⁵⁾我們可以將平均每份省報每天報導的外省數目調整為1955～1956年間的2.5，1975～1976年間的1.4，1995～1996年間的5.4。顯然，這兩種計算方法得出的結論仍然相同，即：中國大陸的省際新聞報導量總的來說偏低，但近年已呈顯著上升趨勢。

或許，有人會說，近年省際新聞流通量的增加是因為省報新聞空間的擴大。對此，我們做了調查，通過計算每份省報在所有三個年段的版數，發現每份報紙在前兩個年段每天一成不變地全是4版，1995～1996年間每天才有平均2.5版的增加量，對外省的新聞報導也較之前有60%的增加。⁽⁶⁾考慮到這些因素，實際的增長應為：1995～1996年較1955～1956年有110%的淨增長率，1995～1996年則較1975～1976年淨增長250%。

不過，這些祇是所有省報的總的平均率，經分省分析後，發現各省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我們拿1955～1956年與1995～1996年進行比較，看出十九個省份呈現上升趨勢，另外八省呈下降趨勢，其中四省下降相對較小（-40%或以下），另外的則相當顯著（-60%至-90%）。福建跌幅最大，達-90%；雲南達-80%；遼寧與甘肅為-60%。這些省份屬於較不發達的地區，與此相反，在較發達省份的廣東、上海、江蘇則呈現不同狀況。它們分別在1955～1956年間與1995～1996年間增幅最大，分別為600%、

340%、320%。如果採用「文化大革命」時期1975～1976年作為基線，比較二十多個省份1995～1996年省際新聞流通量，其增長最多的地方仍然集中於上海、天津、廣東、江蘇等較發達省份，這些省的增幅分別為960%、860%、810%、640%。

二、報導類型分析

除了省際新聞流通的數量，表一還同時顯示了質方面的狀況。在篇幅方面，五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三分之二的省際新聞報導屬普通消息之類型，七十年代這類新聞達85%。看來，由於七十年代的省際消息較少，作為補償，新聞的篇幅長了一些。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新聞圖片類型的報導呈現直線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的省際報導中簡明新聞的類型顯著增多，1995～1996年間這類短消息占了省際新聞總量的26%，而1955～1956年間為7%，1975～1976年間僅為2%。

涉及本省的省際消息在三個年段中都不多，祇占2%左右。然而，就本省為外省所報導的具「新聞價值」的消息數量而言，1995～1996年約為1955～1956年的二點五倍、1975～1976年的近五倍。研究結果顯示，在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中，單方面對外省的報導大大超過互動報導。

三、版面安排

通過縱向比較，可以發現省際新聞版位安排的顯著變化。早前，40%～50%的此類新聞可刊於頭版，而到了1995～1996年間僅有5%在頭版出現。其原因或許在於1995～1996年間的新聞流通量比以前顯著增加。就頭版新聞數量而言，九十年代較諸1955～1956年下跌了三倍，較1975～1976年下跌一半。在五十年代，不少省報的頭版開了簡訊欄，用來刊登省際新聞。這是為何1955～1956年間的省際新聞報導較多的原因。相反，目前流行的做法是將非本地新聞（國家與外省）放到內頁的固定版位上，頭版的重心傾向本省新聞。簡言之，近年省際消息在省報出現的特點是數量增多但重要性減弱。這個特點與我們著眼省際消息的數量、版位等因素的研究設計吻合。

四、報導主題的類型分析

以下我們簡要分析一下省際新聞報導的主題。如表一所示，政治與經濟的消息在中國大陸省際新聞中居主導地位，占五十年代省際新聞流通總量的78%、七十年代的72%。之後，勢頭多少弱化，但仍佔逾半數，58%。在這兩類硬新聞中，經濟報導在1955～56年間遙遙領先，目前稍有弱化，其間1975～1976年間一度由政治報導居多（但是，它們在1975～1976年間的差距不如我們原先想像的那麼高）。

另一個重要特徵是，非政治性的資訊成為省際新聞流通及多元化的主要現象。和前兩個年段相比，九十年代的省際新聞在文化、娛樂、罪案題材方面較五十年代與七十年代分別上升五倍、十倍。趣味性的「軟新聞」也分布更為均勻。⁽⁷⁾運用傳播研究中的變數標準尺度H-statistic（請參考McCombs & Zhu, 1995; Chaffee & Wilson, 1977）衡量，我們發現H-statistic值在1955～1956年間為1.21，1975～1976年間為1.50，而1995～1996年間為1.80（數值愈高，表示內容的多元化程度愈高）。將H-statistic除以H-value的最高值（假定所有八個題目均勻分布），則內容多樣性的分值百分比五十年代為58%，七十年代為72%，九十年代為87%，呈直線上升趨勢。

五、空間分布狀況

表二：省際新聞的空間分布

	1955～56	1975～76	1995～96
被報導：%			
最多的九個省	60	67	61
中間的九個省	27	25	26
最少的九個省	13	8	13
報導者：%			
最多的九個省	42	41	55
中間的九個省	32	32	32
最少的九個省	26	27	13
被報導：%			
最多的五個省	43	52	45
最少的五個省	6	3	5
報導者：%			
最多的五個省	26	24	37
最少的五個省	13	14	7

從受眾角度而言，在所有三個年段中，省際新聞的空間分布主要集中於少數幾個省份。如表二所示，被報導最多的三分之一省份（九個）占了總報導量的60%或以

上，最少的三分之一省份（九個）則僅占13%或以下。⁽⁸⁾兩組間的差距達五至八倍。根據我們的研究顯示，「文化大革命」間的差距最大，即：1975～1976年間為8.4:1；而1955～1956年間為4.6:1；1995～1996年間則為4.7:1。

研究又發現，省際新聞來源至少呈現兩個特點：其一是，資訊豐富的省份（information-rich）與資訊貧乏的省份（information-poor）在以往差距並不很大；其二是，九十年代以來，這個差距則開始呈擴大趨勢。1955～1956年間與1975～1976年間，約四分之一的報導來自前面提過的三分之一被報導最多的省份，但亦有逾四分之一的報導來自最少被報導的三分之一省份，差距為1.6:1與1.5:1。但是，1995～1996年間，九個資訊豐富的省份占了55%的報導量，而九個資訊貧乏的省份僅占13%，比率為4.2:1。

柒、結語

本研究旨在透過新聞流通的角度去認識中國大陸省際交易互動的一個側面，我們採納了國際傳播研究中新聞資訊流通的框架，對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狀況作了初步的定量描述和分析，我們試圖通過這個研究回答一些問題，探討數據背後的因果關係，並試圖歷史地展現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的變動趨勢。

儘管我們的研究仍然是孤立的個案並僅僅是一個開端，但由於研究方法較為系統深入和足夠大的樣本數據，其結果仍然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並由此瞭解省際間四十多年來發生的一些變化。正如研究結果所示，我們可以從諸多資料的多層次分析中得出對省際新聞流通狀況的綜合理解。除了中國大陸區域研究通常採用的東部沿海、中部及內陸三大區域劃分之外，省際新聞流通還顯示了比想像中的傳統模式更為複雜的變化與傳遞結構，與國際新聞流通模式也有所不同，它們之間結構化的因素，深層次的互動關係和影響以及許多相關的問題還有待今後進一步的研究作出解析。

本研究還顯示了後毛澤東時代市場自由化與開放導致了省際新聞流通量的增加趨勢和相應的資訊交換活動。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壯大發展和社會多元化狀態的逐步形成，如同後毛澤東時代大陸社會結構其他領域的深刻變革一樣，這種區域間資訊流通的變化亦將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

註 釋

- (1) 1955～56年間1512個（27份報×28天×2年）；1975～76年間624個（29份報×28天×2年）；1995～96年間1680個（30份報×28天×2年）。
- (2) 北京是個例外，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城市，我們將它的國家和城市的身份作了區別處理，在研究中排除了那些有關中央政府與國家大事的報導。
- (3) 驗證的結果是，在一則新聞中，很少有報導三個或以上的省份。
- (4) 為保持一致性，表一不包括西藏、寧夏、海南三省。
- (5) 更為明確的說，對單獨省份的省際報導平均率1955～56年間為87%，1975～76年間微跌至85%，1995～96年間大幅上升至95%。
- (6) 另外，1995～96年間報紙平均有8版廣告，未被計入。
- (7) 1975～76年間由於對唐山地震的報導，災難性新聞增多，達百分之八。
- (8) 最多的五個省在三個年級中分別占了43%、52%、45%：同期最少的五個省分別僅占6%、7%、5%。

參考書目

- Ball-Rokeach, S., & DeFleur, M. (1976).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76(3): 3-21.
- Breslin, S. (1996). *China in the 1980s: Centre-Province Relations in a Reforming Socialist State*. St. Martin's Press.
- Chaffee, S. & Wilson, D. (1977). Media rich, media poor: two studies of diversity in agenda-holding. *Journalism Quarterly*, 54: 466-476.
- Chan, Roger C. K, Hsueh, Tien-tung & Luk, Chiu-ming (Eds.). (1996).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ang, Tsan-Kuo, Chen, Chin-Hsien, & Zhang, Guo-Qiang. (1993). Rethinking the mass propaganda model: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regional press. *Gazette*, 51: 173-195.
- Cheung, T. Y. Peter (1998). Provincial leadership and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an introduction. In Peter, Cheung Chung, T. Y Jae Ho & Zhimin Lin,

- (Eds.). *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 pp. 3-46. Armonk: M.E. Sharpe.
- Cheung, T. Y. Peter, Chung, Jae Ho & Lin, Zhimin (Eds.). (1998). *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 Armonk: M. E. Sharpe.
- Chomsky, N. (1987). *On Power and Ideology: The Managua Lectur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Chu, L. (1994).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media refor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 4-21.
- Chung, Jae Ho (1995). Studies of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mid-term appraisal, *China Quarterly*, 1995(142): 487-508.
- Chung, Jae Ho (1998). Study of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ao reform era---issues, approaches, and sources. In Cheung, T. Y. Peter, Chung, Jae Ho & Lin, Zhimin (Eds.). (1998). *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 Armonk: M. E. Sharpe. pp. 429-456.
- Forster, K.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New York: Sharpe.
- Galtung, J., & Mari H. R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1): 64-90.
- Gerbner, G. (1964).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tical tendencies in news reporting, *Journalism Quarterly*, 41 (3): 495-508, 516.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ber, Doris A (1989).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 Golding, P., & Harris, P. (Eds.). (1997).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Globalis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Sage.
- Goodman, D. (1986). *Centre and Provi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man, D. (Eds.). (1997).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UK: Routledge.
- Goodman, D. (1997). How open is chinese society? in D. Goodman & G. Segal (Eds.).

- China Rising: Nation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Routledge, pp. 27-52.
- Hamelink, C. (1983). *Cultural Autonom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Longman.
- Hamelink, C. (1995). Information imbalance across the globe, in J. Downing & A. Sreberny-Mohammadi (Eds.). *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age Publication, pp.293-307.
- He, Z & Chen H. (1998). *New Perspective of China Media Studies*. (in Chinese) Hong Kong Pacific Press.
- Herman, Edward S (1986). Gatekeeper versus propaganda models: A critical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Golding, P. & Murdock, G. & Schlesinger, P. (Eds.). *Communicating Politic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NY: Holmes & Meier.
- Herman, Edward S & McChesney, Robert W (1997).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London: Cassell.
- Hester, A. (1971). An analysis of news flow from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Gazette*. 17, 29-43.
- Hu, A., Wang, S., & Kan, X. (1985).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China: Liaoning People's Press. (In Chinese)
- Hur, Kyoong (1984). A c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research.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pp.365-378.
- Jia, Hao and Lin, Zhimin (Eds.) (1994). *Chang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China: Reform and State Capac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Kariel, Herbert G. & Rosenvall, L. (1983). Cultural affinity displayed in Canadian daily newspap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60): 431-436.
- Kariel, Herbert G. & Rosenvall, L. (1984).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Journalism Quarterly*, (61): 238-247.
- Lee, C. C. (Eds.). (1994).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Lee, C. C. (Eds.). (2000). *Money, Power,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nt, John A (1977). Foreign news in american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 (1): 46-51.
- Li, L. (1996). *Guangdong playing the 'foreign card' in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8-1996*.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ub-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Comparative Approach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cember 6-7.
- Li, L. (1998). *Centre and Provinces: China, 1978-1993: Power as Non-Zero-S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eberthal, K. & Oksenberg, M. (1988).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ppmann, 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 Liu, Alan P. L. (1988). How can we evaluate communis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performance?. In Shaw, H. (Eds.)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in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Westview Press.
- Liu, Alan P. L. (1993).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post-mao mainland China, In Lin Bih-jaw & Myers Jane (Eds.). *Forces for Changes in Contrmpe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p.120-141.
- Maclean, M.S., & Pinna, L (1958). Distance and news interest: scarperia, italy, *Journalism Quarterly*, (35): 36-48.
- McCombs, M. & Zhu, Jian-Hua (1995). Capacity, Diversity, and Volatility of the Public Agenda: Trends from 1954 to 1994.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 495-525.
- Mowlana, H. (1984).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the U. S.-iranian conflict. In A. Andrew, and W. Dissan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Muir, R. (1981). *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 London: Macmillian. 2nd Ed.
- Ostgaard, E. (1965).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low of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2(1): 39-63.
- Polumbaum, J. (1997). Political fetters, commercial freedoms: restraint and excess in Chinese mass communication. In Hudson, C. (Eds.). *The China Handbook*.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pp. 211-226.
- Schramm, W., & Erwin, A. (1981). *Circulation of News in the Third World: A study*

- of Asi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Skurnik, W. A. E. (1981). Foreign news coverage in six african newspapers: the potency of national interests. *Gazette* (28): 117-130.
- Shirk, S.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reberny-Mohannadi, Annabelle, et al (Eds.) (1997). *Media in Global Context: A Reader*. Arnold.
- Stevenson, R. (1988).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Third Worl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Longman.
- Stevenson, R., & Shaw, D. (Eds.) (1984). *Foreign news and 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Ames, Iowa: The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Teiwes, F. (1971). Provincial politics in china: themes and variations. In Lindbeck, J. (Eds.).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116-189.
- Tsang, K.,Y., et al (1988). Geographic emphases of international news studies. *Journalism Quarterly*, 65(1): 191-4.
- UNESCO (1984). *Foreign News in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in 29 Countries. Reports and Papers on Mass Communication*, No.93.
- Vogel, E. (1989).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 (1993). The world-systems after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0): 1-6.
- Wallerstein, I. (1999).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21 century*.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Wang, Shaoguang & Hu, Angang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M. E. Sharpe.
- Wu, Guoguang & Zheng, Yongnian (1994).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entre and Local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Wu, H.D. (1998). Investig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a meta-analysis. *Gazette*, 60 (6): 493-512.
- Yeung Yuetman & Chu, D. (Eds.) (1994). *Guangdong: Survey of a Province under*

Rapid Chang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Zhao, X. (1996). Spatial dispar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953-92: a comparative stud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7(1): 131-163.

鳴謝

本研究獲得香港浸會大學學術研究基金資助，在此表示感謝。

News Flow in Mainland China -- a longitudinal study

Yu Huang & Jonathan Zhu *

ABSTRACT

Existing abundant literature on the news flow study has just focu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or transnational level. However, the flow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within national boundaries is equally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geographically large countries with a vast, diverse and disparate population. Mainland China is certainly a case in point. The purpose of this pioneering study is to further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framework to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through its empirical basis on the case study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news exchange.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the current study can be viewed in several respects. First, it uses th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study to test the domestic situation and hence extend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research tradition. Second, it tak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in order to identify shifts in the pattern of news flow since the 1950s. Third, it provides some first-hand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decentralisation in post-Mao Chinese reform.

Keywords: news flow, inter-provincial information exchange,
provincial media, longitudinal analysis

* Dr. Yu Hu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r. Jonathan Zh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rogram Director of MA in Communication and New Media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